

# 中国现存会馆剧场调查

车文明

作者赐稿

—

## 一、会馆概况

会馆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公共建筑，但实质上是一种民间性的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主要由异乡人在客地设立，也有一地同业人兴办者。它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宗旨，依照一定的规则，自愿结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社会组织，类似于今天的社团。所谓“仕宦商贾之在他乡者，易散而难聚，易疏而难亲，于是立会馆而联络之，所以笃乡谊也”<sup>[1]</sup>。同乡组织一般叫会馆，同业组织一般叫公所，但二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上海县续志》就说：“或称会馆，或称公所，名虽异而义则不甚相悬，故不强为区分。”<sup>[2]</sup>本文在一般性论述时一律称“会馆”。由于多数会馆都供奉神灵，并定期祭祀，且布局与神庙很类似，所以不少会馆又被命名为“某某庙”或“某某宫”，其中最常见的是“关帝庙”与“天后宫”。

会馆形成于明代前期，明中期至清咸同时期是其兴盛阶段，清末到民国阶段逐渐蜕变衰落。进入民国以后，会馆、公所向两个方向转化，地缘性为主者改组成同乡会，而业缘性为主者则改组成同业公会。到 1950 年代后，会馆作为一种制度在中国大陆绝迹，仅留下一些宏丽的建筑。

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在京官吏的聚集之所而出现的，史料表明，在明朝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江西浮梁人、广东人等最先在京师建立会馆<sup>[3]</sup>，直至正德、嘉靖时，会馆仍主要是官绅聚会的一种场所。万历时人沈德符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sup>[4]</sup>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朋党政治的需要，大约从明中叶开始，会馆开始接待同乡来京应试士子，有的还添设新馆作为接待应试子弟的场所。于是，原来的会馆变为兼作试馆或另外专设试馆便蔚然成风。甚至在分布区域上都有差别，明末人刘侗、于奕正说：“内城馆者，绅是主，外城馆者，公车岁贡是寓。”<sup>[5]</sup>当然，区分不是绝对的，多数是二者兼有。清代闽县陈宗蕃就说：“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曰会馆，或曰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人，联旧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来京假馆之所，恤寒畯而启后进也。”<sup>[6]</sup>闽县程树德说：“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自清季科举停罢，遂专为乡人旅京者杂居之地。”<sup>[7]</sup>此外，留都南京在嘉靖年间也建有类似的会馆<sup>[8]</sup>。

商业性会馆在明清会馆中数量最多、建筑最华丽，散布于全国各大都市和工商城镇。一般认为，商人会馆初见于万历时期的苏州<sup>[9]</sup>。人称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sup>[10]</sup>。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开封、洛阳、芜湖、湘潭、汉口、广州、福州、成都、重庆、云南会泽等地，商业性会馆也随着商业的不断繁荣而大量出现。其中，徽商、晋商、广东商、宁波商、陕西商、江西商、福建商、山东胶州商、湖北荆州商等都是当时颇具规模、实力雄厚的商帮，在各地建立了不少会馆。手工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行业性会馆也在一些地方，如北京、苏州、上海、湘潭、佛山、广州等地大量出现。

明清经济演变的另一个特征是人口流动，由移民设置的同乡会馆以长江沿线的江西、湖广和四川为最典型，在台湾、东北也有存在。因为移民本身多带有商业性，实质上与大都市和重要城镇的工商会馆貌异而实同。

京师、省城是国家与各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往往也是会馆集中的地方，这是由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各省人士侨寓京都，设馆舍以为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且不独京都也，外省府、州、县，亦合官商而通力合作之，惟不及京师之多，且又有数省合建者”。<sup>[11]</sup>据吕作燮先生统计，清代北京有会馆445所<sup>[12]</sup>。王日根《中国会馆史》罗列出358座北京会馆名单<sup>[13]</sup>。李金龙、孙兴业主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收录明永乐十三年（1415）至1949年12月在北京所建的会馆共计647处<sup>[14]</sup>。苏州的会馆、公所有160余处<sup>[15]</sup>。汉口有明确成立时间的会馆公所就达123处<sup>[16]</sup>。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统计，上海的各种会馆亦有100多所。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就达88座<sup>[17]</sup>。即使在一些县城、集镇也时有会馆建筑的记载，据李华先生研究，“在湖北农村（主要是县城和大市镇）建立的商人同乡组织——会馆，可能有五十余座，这些会馆有的明确记载：某地‘商人公建’，某地‘商民共建’。这些会馆是商人会馆，或有地方商人参加筹建的会馆。”<sup>[18]</sup>其余如云南会泽县、河南南阳赊旗镇（今社旗县）的会馆更是保存至今、名扬天下。可以说，在其发展时期，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北至东北、内蒙古等地，南至闽粤台直到海外，东至沿海，西至甘肃、新疆，都有会馆兴建。

会馆在建筑与信仰上类似神庙，里面也要供奉神灵。会馆所供神灵一般有几类：①乡土神，如山西、陕西人供关羽为关圣大帝，福建人尊林默娘为天后圣母，江西

人奉许逊许真君，浙江人奉伍员、钱镠为列圣，云南人奉南霁云为黑神，广东人奉慧能为南华六祖等；②行业神，如木石匠业之鲁班、医药业之药王、陶瓷业之窑神、梨园业之老郎神、银钱业之财神赵公明、酒业之杜康等；③一些影响广泛、保护功能强的神灵如关帝、大禹、天后、文昌等不限于地域，成为跨地域甚至全国性的会馆神灵。与中国古代宗教多神信仰的庞杂性、随意性、附会性、实用性等特征相一致，明清会馆的神灵设置也多由最初的一神供奉而变为多神供奉，即除主神外，还设置若干配享神。如北京的山西临襄会馆供奉协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火德真君、酒仙尊神、菩萨尊神、马王老爷诸神<sup>[19]</sup>，湖广会馆既奉乡贤，又供文昌。上海的豫章会馆“正殿供许圣真君，旁殿供奉五路财神，厅楼供奉文昌帝君诸神像”<sup>[20]</sup>。聊城山陕会馆中殿祀关圣帝君，左侧殿祀文昌神、火神，右侧殿祀财神、金龙四大王。佛山福建会馆（天后宫）“中奉天后元君暨地藏仁师、龙母夫人，上祀文武二帝，旁祀惠福夫人”<sup>[21]</sup>。还有的会馆前祀天后，后祀关帝。

前人多把会馆的功能概括成“答神庥、睦乡谊”<sup>[22]</sup>、“祀神明而联桑梓”<sup>[23]</sup>，或者“祀神、合乐、义举、公约”<sup>[24]</sup>。广东潮州《汀龙会馆志》说：“或曰会馆非古制也，而王律不之禁者何也？予曰：圣人制天下，使民兴于善而已。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明有亲也，以崇神祀明有敬也，往来有主以明礼也，期会有时以明信也。使天下人相亲相敬而持之礼信，天下可大治，如之何其禁耶？”<sup>[25]</sup>概而言之，会馆有以下几种功能：①社会整合。会馆建立的意义就在于它能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在乡贯的旗帜下聚集在一起，树立起会馆的威信，做为人们向上发展与落魄无归的依靠，同时要求会员遵守规章制度，维护集体、行业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发挥社会整合作用。②参与地方事务，会馆尽管是一种同乡或同业的民间自治组织，但也必然参加当地的一些地方事务，有时发挥着比地方政府都大的作用，可以视为地方事务的一种特殊类型或存在形态。③慈善公益，如救济同乡、同行，安葬客死他乡无人照料者，捐资兴庙、助学，修桥补路等。同时，对其家乡的公益善举，同乡团体亦能贡献良多。④文化交流与传播。会馆的建立使当地文化得以与别的地域文化进行交流，产生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举凡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建筑、雕塑、绘画、戏曲等领域，都有传播与交流。

会馆建筑规模差异较大，有的占地数千甚至上万平方米，殿宇廊庑几十或上百间，有的仅为一小室，占地数平方米。规模较大的会馆，多建有戏台。北京“玄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sup>[26]</sup>。有的甚至是几座戏台，如毁于抗战时期的汉口山陕西会馆共有 5

座戏台[27],宁波庆安会馆有前后两座戏台。京师作为首善之地,会馆最多,会馆剧场也独占鳌头,据周华斌先生统计,清代北京的会馆剧场有 17 处,[28]王强《会馆戏台与戏剧》统计有 26 处,新增 9 处[29],《北京会馆资料集成》据实地调查与民国档案统计新增 8 处[30],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介绍四川新馆 1 处[31],几项合计共 35 处,现存 7 处。上海的会馆剧场有 18 处,现存 4 处。苏州的会馆剧场有 15 处,现存 3 处。其它如天津、聊城、烟台、洛阳、社旗、周口、张掖、成都、自贡、会泽等地并有会馆剧场遗存。令人遗憾的是,全国现存会馆剧场仅 80 座(见附录)。

## 二、会馆剧场布局

会馆格局基本上是仿照神庙建筑,有的干脆就叫“某某庙”。一般坐北面南(也有因地势而不同者),四周围成一个长方形四合院。规模较大的会馆剧场建筑布局为沿中轴线从南到北(指会馆坐北面南者)依次为山门、戏楼(一般为过路台,戏台建在山门上)、献殿、正殿(有的两侧有侧殿或朵殿,供配享神)、寝殿(关帝庙多为二层春秋阁),戏楼与献殿间是宽阔的庭院,两侧建有看楼、厢房,山门戏楼两侧多建有钟鼓楼。

潮州福建汀龙会馆是当地清代一座最大的会馆,规模较大,记载较全,可窥一豹:

馆在潮州城开元街之系福胜庙右手下畔,坐北朝南,馆门当街。正中为大门,门檐外加木栅门,左右二角门,门侧左右各一门房。直入中门,内为春秋演戏台,正中为天井雨坪,左右二廊,道光戊戌年改建东西二酒楼。正厅堂为奉祀天后圣母,正殿左侧耳厢为财神殿,右耳厢为福德祠,均祀木主,设神龛,前为天井,俱有门与酒楼相通。财神殿左横屋一直深与馆基等,上为客厅,咸丰癸丑年改修,兹仍京都汀州乡馆堂额为‘旅翠堂’。厅屏后为小眠房,厅前开小天井,左出留天空,下开一水井,中用花窗屏扇隔一小厅,坐东面西,为祭祀更衣所,厅右隔小房。再出为厨房,中开大门当街路。门外左侧抽一厕所。馆后并左右俱黄姓房宅,馆有抽开小巷以通,然路墙檐下有滴水坑出街沟。馆门距街正对照墙一面,其墙下基址属馆内地。[32]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坐西朝东,面临古大运河,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历时 66 年,1988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会馆占地面积 3311 平方米,东西长 77 米,南北宽 43 米。会馆三进院,自东向西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过楼、戏楼、中献殿、关帝殿、春秋阁。山门至戏楼为狭窄的前院,两侧还有钟鼓楼、夹楼等。戏楼与正

殿间为中院，两侧建有看楼、碑廊，正殿两侧还有财神殿、火神殿以及二献殿。后院春秋阁两侧还有望楼等。



（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鸟瞰图，采自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

《中国古代建筑·社旗山陕会馆》第 113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年间<sup>[33]</sup>，一直延续到道光时期，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十六年（1890）重建，1988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会馆坐北面南，南北长 152.5 米，东西宽 62 米，占地近万平方米。会馆为三进院，自南而北沿中轴线依次建有琉璃照壁、悬鉴楼、石牌坊、月台、大拜殿、大座殿、春秋楼（仅存遗址）。琉璃照壁与悬鉴楼组成前院，悬鉴楼前为一半开敞式导引空间，其前设铁旗杆、双石狮，东西两侧为东西辕门及马棚。悬鉴楼与大座殿间为中院，两侧设东西廊房及二层看楼，悬鉴楼左右设钟鼓楼，正殿（大座殿）两侧还有朵殿药王殿、马王殿（前亦有献殿）。后院原有春秋楼，规模较大，今仅存遗址。主院西北部有西跨院，自南而北原有四进院落，今仅存最北之道坊院，为管理会馆之道士起居兼接待往来显贵之所，由门楼、凉亭、接官亭及东西厢房组成。



（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鸟瞰图，采自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中国古代建筑 社旗山陕会馆》第 113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四川自贡西秦会馆（亦名“武圣宫”“关帝庙”）由陕西籍盐商所建，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落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道光七至九年（1827—1829）又扩建正殿，1959年辟为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会馆背靠龙凤山，依地势座东北，面西南，中轴线长80米，占地约3000平方米。其平面布局亦为中轴对称布置，前为大门，背面为献技诸楼，其中二层就是过路戏台，过庭院北为抱厅、参天阁、中殿、正殿。庭院两侧有二层看楼以及贡鼓、金庸两阁（钟鼓楼）。参天阁及正殿两侧建有客廨、内轩、神庖等。



（四川省自贡市西秦会馆平面图，采自孙大章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清代建筑》第26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还有一类，会馆分前后院，建两座戏台者。如宁波庆安会馆、安澜会馆、成都洛带镇江西会馆。庆安会馆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座东朝西，中轴线上依次有照壁、接使（水）亭、宫门、仪门、前戏台、正殿、后戏台、后殿，左右为厢房与看楼、耳房及附属用房。照壁接水亭已毁，两座戏台毁于 20 世纪 60 年代，2001 年依原样重建。据会馆管理处负责人介绍，两座戏台略有分工。前戏台面对正殿，主要用于祭祀演出；后戏台面对后殿，主要用于宴飨、聚会演剧。安澜会馆始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座东朝西，布局与庆安会馆基本一致。两座会馆相邻，座落在宁波三江口东岸，分别由当地南北船商兴建，祭祀妈祖，2001 年被列入国保。成都洛带镇江西会馆由江西客商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主体建筑由乐楼、左右厢房、院坝、前、中、后三殿及小戏台构成。小戏台位于中、后殿之间的天井里。



（浙江宁波庆安会馆平面图（宁波庆安会馆管理处提供））

也有一些规模不大的会馆剧场，如上海三山会馆创建于清宣统元年，由旅沪闽籍果橘商人兴建，三山指福建赵王山、九仙山、闽山。会馆位于南市区中山南路，坐北面南，1986 年因中山南路辟通工程，整体南移 30 米，院宽 24 米，占地四亩余，头道山门为砖砌西式门楼，一道砖墙，东西开二券形门，二道山门上为戏楼，院东西有看楼与戏楼后台相连，最北为正厅。四川自贡南华宫（广东盐商会馆）只有山门戏楼、两侧看楼、正殿。自贡贵州庙则仅有山门戏楼、正殿以及几间东西厢房。

还有一种全封闭式会馆剧场，主要集中在北京等大都市，目前所知仅存有北京湖广会馆剧场、平阳会馆剧场、正乙祠剧场、安徽会馆剧场、四川新馆剧场，天津广东会馆剧场等。这种由戏台与观众席组成的室内剧场，已经是纯粹的“剧场”了。由于观众席封顶，木结构跨度有限，所以剧场内只建有戏楼、周圈上下两层看楼、中间观众席池子。而供奉神灵的正厅建在前（后）院，客房等其它建筑布置在两侧跨院。北京湖广会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虎坊桥，始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道光十年（1830）重修，并增建戏楼、盖棚。会馆坐北面南，占地近 8000 平方米，入口设在东部。全馆分三路，中路自南至北建有戏楼（即室内剧场）、客楼、正厅，东西路分为若干跨院，作为宿舍与服务房间用，三路中间有行廊将三座建筑相互联络。



（北京湖广会馆平面图，南部为室内剧场，采自采自  
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清代建筑》第 25 页，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年。）

天津广东会馆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两进院组成，前院为正厅院，后院就是带棚罩顶的室内剧场。剧场与一般会馆剧场一样，三面设楼廊为看楼，中间为池座，南边设戏台。



（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清代正殿、献殿）

### 三、剧场主要建筑

#### 1、戏楼

会馆是一种多功能、综合性的建筑，有祭祀、聚会、住宿、娱乐等用途，但只要有戏楼的会馆，剧场必然是其主要建筑，而戏楼的华丽往往超过正殿，成为会馆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室外戏楼基本是过路台，下层为通道，上层建戏台，前台有伸出式、镜框式两种。室内戏台基本上是单层，偶有双层，表演区也在下层，上层一般是存放行头、道具甚至杂物的地方，偶然也作为装扮神仙的演员“从天而降”的地方，前台基本上为伸出式。



（上海市三山会馆清代戏）



屋顶是会馆戏楼建筑中最华丽壮观的部分。过路台本身就高于单层戏台，给人一种高高耸立的感觉。更为重要的是，清代所有类型的戏台在屋顶的形制上有了重大变化。古代木结构建筑屋顶曲线的处理方法叫举架（宋元时叫举折），梁架的高低（举高）与整座建筑的通进深有一定比例，唐代一般为  $1/5$  左右，相当舒缓，宋、辽、金、元时举高一般为通进深的  $1/4$  或  $1/3$ ，也比较平缓，现存元代戏台举折即在  $1/3—1/3.5$  之间。明代建筑举高开始增大，到清代，则提高到  $1/2$ ，这样，屋顶坡度变陡，使整座建筑变得陡峻崇高。再加上二层甚至三层的结构，使山门戏楼这座复合建筑高耸入云，分外醒目。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自地面至屋顶通高达 22 米。同时，古代建筑屋顶之四角多向上翘起，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建筑上叫翼角翘起。江南地区更是把嫩戗（子角梁）插在老戗（老角梁）之上，使翼角高翘，耸起如半月状，十分轻巧灵动。这样就使得屋顶造型特别优美生动。屋顶叠落穿插是清代建筑屋顶变化的一种形式。有的（闽南一带为代表）将门屋屋顶一分为三，做成中高侧低的叠落屋顶；有的做成十字脊歇山对穿式，甚至加设龟头厦屋；有的在大屋顶上叠造小屋顶；也有的局部抬高出一个歇山屋顶，称为叠楼。湖广、四川地区还常把两翼屋顶做  $45^\circ$  切割，显出宽厚的博风板<sup>[34]</sup>。对戏台建筑而言，建筑师们匠心独运，在屋顶设计上尽力翻新花样，以至于许多戏台无法以规范的单檐、重檐，歇山、悬山、硬山、攒尖等术语来描绘。这一点在会馆戏楼中尤为突出。

山东聊城市山陕会馆戏楼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重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过路戏台屋顶以重檐歇山为基调，上层四面又出抱厦，共成十二翼角，通高约 16 米，“基广十数弓，高出云表，前三楹与正殿对峙，上可容梨园子弟百余……虽天上之琼楼玉宇何让焉。”<sup>[35]</sup>

四川自贡西秦会馆乾隆十七年（1752）山门式过路戏台——献技楼上下共三层，下层为山门，中间为表演区，上层为大观楼（见彩页）。屋顶三重檐，顶部为六角攒尖式，远望若武将头盔，当地称“将军帽”；下两层为歇山式，其中底层檐中部被割断，露出部分枋柱结构，安排窗棂、板壁及博风抹斜，使立面造型显露出来，改变了长屋檐的沉闷感，这种做法使被孙大章先生称为“破中”<sup>[36]</sup>。其外部山门屋顶更是汇集了叠楼、多檐、主副屋顶（破中）及切割山面诸种手法形成的华丽屋顶组合这样使主表演区分外高峻，整座建筑既挺拔高耸，富丽堂皇，又主次分明，错落有致。

河南社旗县山陕会馆嘉庆元年（1796）创建、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建之悬鉴楼与山门为一体，前台重檐歇山顶，其中明间破中；后台为山门上层，顶部歇山式，高于前台（见彩页）。整体形状三重檐歇山琉璃顶，八角凌空，飘飘欲飞，十分壮观。从地面到屋顶通高达 22 米。

云南会泽县江西会馆康熙五十年（1711）戏楼为过路式一面观，通面阔五间，戏楼前部为五重檐歇山式，中间用“破中”之法，使中部高耸空旷。破中之处又设神阁，供奉福禄寿三星（见彩页）。每层翼角均施牌楼式如意斗拱，精巧玲珑，异常壮观。湖北襄樊抚州会馆嘉庆七年（1802）过路台为歇山式，两翼三重檐，呈阶梯式，下面两层檐正中空缺“破中”，使戏台挺拔高峻而无压抑之感。其它如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雍正十三年（1735）过路戏台、洛阳潞泽会馆乾隆九年（1744）戏台、上海钱业会馆光绪十九年（1893）过路戏台、苏州全晋会馆光绪间过路戏台等都是壮丽宏伟的建筑。

雕塑、绘画为主的建筑装饰使会馆戏楼成为一座绚丽斑斓、华美多姿的艺术殿堂。清代是中国古建筑装饰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而会馆、尤其是商业会馆，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优越的信息，投入巨大资金，广聘能工巧匠，使会馆建筑成为建筑装饰艺术的杰出代表。戏楼，本身就是展示艺术的场所，同时作为规模较大会馆的标志性建筑，自然成为精雕细琢的对象。举凡柱础、柱头、梁枋、斗拱、檐板、撑木、门窗、隔断、栏板、藻井、天花、墙壁、匾额等都成为雕刻、彩绘的对象。雕刻种类主要有木雕、砖雕、石雕三种，手法则有浅浮雕、深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等。绘画基本为彩画，主要有旋子彩画、苏式彩画以及风格各异的地方彩画，有的使用贴金彩饰。此外，还有灰塑、琉璃饰件等装饰。装饰内容从草木花卉、鸟兽鱼虫、山水楼阁、吉祥图案、各种器物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曲场面、生活场景等，十分丰富。著名的安徽亳州山陕会馆戏楼因装饰华丽而被称为“花戏楼”，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献技楼、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等，都是装饰瑰丽的建筑精品。

藻井是会馆戏楼建筑的有一搭亮点。藻井多见于宫殿与寺庙中，是安置在庄严雄伟的帝王宝座上方或神圣肃穆的佛堂、神殿内佛像与神像顶部天花中央的一种“穹然高起，如伞如盖”的特殊装饰。戏台用藻井，确有“僭越”之嫌，但历代不乏，除了扩音作用外，也可看出民众对戏曲之喜爱推崇。与地方建筑风格向一致，江南的会馆戏楼几乎全部用这种穹窿形藻井。藻井造型大体由上中下三层组成，下层为方井，由四周阑额上之斗拱组成（无斗拱者即由阑额组成），方井之上通过抹角梁、正斜套方使井口由方

形变为八角形，此为方井向圆形井过渡部分，正、斜枋子在八角形外围形成许多三角形或菱形，称为角蝉，平面安天花板，上嵌龙凤等雕饰。在八角井内侧角枋上雕有云龙图案的随瓣枋，将八角井归圆，形成圆井，圆井之上再以单挑斜栱（20组左右）层层收缩（20层左右）呈螺旋形，至顶形成一圆井，井上盖板，又称明镜，盖板之下或雕盘龙，龙头倒悬，口衔宝珠，使藻井构图中心更为突出，繁简对比明显。上海三山会馆清末戏台、钱业会馆光绪十九年（1893）戏台、苏州全晋会馆清末戏台、天津广东会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室内戏台、宁波庆安会馆等都是这种由如意斗栱组成的螺旋状穹隆藻井。其余不用藻井的戏楼，也多设天花，彩绘、雕饰华丽。

戏楼多用木隔断分隔前后台，设上下场门。后台与左右耳房为演员化妆休息室，耳房一般与院两侧看楼相通。

戏楼面积各有差异，江南一带比较小巧，其余地方多宽阔之作。上海钱业会馆戏台前台一间，6.4米见方，后台进深1米，左右耳房2.4米见方。苏州全晋会馆戏台前台一间，6.3米见方，后台深4.7米；两侧耳房各两间，面阔5.2米，进深同后台。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献技楼戏台通面阔三间9.25米，其中明间阔4.95米；通进深两间8.3米，其中前台深5米；两侧耳房各两间，通面阔8.6米，通进深8.8米。聊城山陕会馆通面阔三间8.32米，其中明间阔4.15米；通进深三间7.32米，其中前台深4.33米；两侧耳房各一间，面阔2.8米，进深2.7米。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通面阔三间11.8米，其中明间阔4.8米，进深十一椽（包括山门部分），13.48米，其中戏台进深9.85米，前台深4.5米。甘肃张掖山西会馆戏台通面阔三间8.2米，其中明间阔4.8米；进深9.4米，其中前台深4.87米。北京湖广会馆戏楼一间5.68米见方。

## 2、看楼

大约在明代末期，祠庙剧场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二层看楼”（供妇女儿童使用），它位于庙院两侧（一般为东西相向而列），下层屋起原来厢房的作用，上层则作专门观剧场所，上下层前檐多出廊，上层前檐又设栏杆。经过长期探索，一种新兴的、比较完善的庙台广场式剧场形制正式诞生了。看楼纯为观剧而设，为妇女儿童专席，它在不扩大观剧广场水平范围（广场太大，无疑不利于后面的人观看）的前提下开阔了观众席，对于伸出式戏台来说，在看楼上观演可一览无余，确实也是个角度较好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二层看楼的设置，进一步规范了男女分群看戏的规矩与习俗，确实能“严男女之大防”，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礼教的盛行与威严。这一一举多得的创举，

是古代神庙剧场发生的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这一变化对清代剧场布局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祠庙剧场形制的典范代表。

会馆剧场一般在院两侧与戏楼垂直方向建有二层看楼，早期确为妇女儿童观剧场所，到清末民国初年，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男女不能混杂看戏的规矩被打破，看楼也成了上等座位，而不局限于妇女儿童了。室内会馆剧场在靠近戏楼处或设几间二层包厢，专供有地位、有钱者使用，不一定局限于妇女儿童。看楼建筑一般比较简单，多为悬山、硬山顶，有的出单坡。一层多设厢房，前为廊，可为观众避风雨；二层前面敞开，以便观戏，同时设1米左右高的护栏。在元明时期，一般普通的神庙里，院两侧是配殿、厢房的位置。到清代，看楼建筑之风流行后，配殿建筑相对减少，表明神庙剧场的“剧场”意味加重。会馆剧场中基本没有配殿，戏楼至正殿之间的庭院两侧全部建成看楼，“剧场”的比重更大。同时，正殿前的献殿（或献厅）也是演戏时达官贵人的观剧之所。这样，由献殿、看楼三面围拢，加上中间庭院，组成观众席。至于会馆中的封闭式室内剧场，上层看席三面围拢，下层设池子，正面为戏台，已经是纯粹的“剧场”了。

看楼的大小随会馆建筑规模大小而各不相同。上海钱业会馆西侧看楼10间，通长20米，东侧看楼6间（北有偏门）；两侧看楼进深3.5米；院宽12米，深20米。山东聊城山陕会馆两侧看楼各5间，通长15.8米，进深4米。戏台台基距献殿台基25.8米，是为院深，看楼相距31.9米，是为院宽。四川自贡西秦会馆两侧卷棚看楼各7间，通长33.05米，进深4.1米，其中中间一间建成重檐歇山式钟鼓楼，分别命名为“金镛”、“贡鼓”。戏台台基至抱厅台基31米，是为院深；因戏台前台伸出2.1米，看楼深入其伸出部分，故比院深多出2.1米。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两侧看楼各13间，通长37.94米，进深3.85米；戏台台基至大拜殿台基47.1米，是为院深；东西看楼间距32.35米，是为院宽。

#### 四、会馆戏曲活动

前人将会馆功能概括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sup>[37]</sup>，其中同乡聚会演剧娱乐是一项重要事务。虽然也以敬神为标榜，但会馆剧场不同于一般神庙剧场，娱神的成分较小，娱人的意味更浓。一般神庙剧场演戏具有季节性，以庆祝神诞、春祈秋报为主，间或增加几场还愿戏、开光戏甚至“罚戏”（因违反乡规民约而出资演戏，以示惩

戒），一年中没有多少次，大多时候，戏台是闲置的。而会馆戏楼则不同，它的演出除了定时性（如所供神灵诞辰）外，还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频繁性。举凡建修工程落成、店铺开张、违反行规罚戏以及同乡聚会、会馆待客等都要演戏，不能说日日有戏，但隔三叉五就演出是肯定的。有时，会馆因演戏成为其主要功能，而被人们理解为专为堂会演出设立的戏园。据夏蔚如《旧京琐记》云：

堂会演戏，多在宣外财神馆、铁门文昌馆。至光绪甲午后，则湖广馆、广州新馆、全泽会馆继起，而江西馆尤为后进，率为士大夫团拜宴集之所。以此记载观之，是财神馆当时本为堂会演戏之所，非专寓于闽人，他省人亦可借用之。郑稚辛孝廉孝桧亦云同光间常至该馆观剧，闽浙总督巡抚到任者，出京时，闽之同乡京官恒借此演戏饯之，成为定例。<sup>[38]</sup>

清代戏曲家杨恩寿在《坦园日记》中明确记有在各地会馆看戏的日期近 30 余处，这些观剧的时间月朔月望，年初年终都有，所记会馆分属各省地所建，凡是“晴”、“公宴”、“酒阑”、“晡后”皆观剧，可见会馆剧场演戏之频繁。下面是设在潮州的福建汀龙会馆一年中的演戏日程：

正月初五日，福织纲祈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二月初一日，运河纲祈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十八日，上杭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十九日，运河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日，九洲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一场。

三月二十一日，本立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一场。

三月二十二日，龙岩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一场。

三月二十三日，汀龙众帮公祭，庆祝圣母千秋诞辰。预期各纲董理公择贴，请主祭与祭各执事前一夜习仪，众办主与祭执事二便席。是夜演戏，各纲分办酒席预祝。二十三日卯刻致祭，辰刻主与执事二面席，午刻饮福二席，由众办。其余各纲早晨观祭，午刻饮福，酒席俱各纲自行分办。是日演戏连宵，亦各纲自办夜席庆祝。

三月二十四日，簪纸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五日，福纸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六日，履泰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七日，武平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八日，莲峰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六月初三日，福纸纲预祝土地福德神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每年秋九月，汀龙众帮公祭，庆祝圣母飞升，章程与春季同。

九月初六日，上杭纲分祭，预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初七日，运河纲分祭，预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初八日，九洲纲分祭，预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初九日，汀龙众纲分祭，预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连宵。

九月初十日，汀龙众纲预祝财神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十一日，莲峰纲分祭，庆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十八日，运河纲庆祝财神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二十二日，福纸纲补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连宵。

九月二十三日，本立纲补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十二月初一日，运河纲酬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十二月二十四日，福纸纲酬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换袍季，每年演戏壹台，午刻饮福。<sup>[39]</sup>

会馆剧场不仅同乡、同行入自己安排演戏，有时还借于外人使用，收取一定费用。

如北京药行公馆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落成时“公议规条”13款，其中一条规定：

“同行人在馆演戏庆吊，不议家伙台费。”<sup>[40]</sup>可见，外行人借用会馆戏台演戏，是要付费的。一般而言，每个会馆都各自有自己的经费来源，或靠官商自愿捐助，或靠商人的抽厘，或靠房租等。

商路就是戏路，这是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清·陈彦衡《旧剧丛谈》载：“当时徽班之外有梆子班。清季北京银号皆山西帮，喜听秦腔，故梆子班亦极一时之盛，而以义顺和、宝胜和两班为最著名。”<sup>[41]</sup>清末汉口山陕西会馆（已毁）正殿前戏台对联曰：“阳春白雪有新声听楚客歌来偏传汉上，铁板铜琶翻古调问乡音操处忆否关西。”<sup>[42]</sup>说明台上表演的既有当地戏曲，又有家乡剧种。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散失（比如，许多会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档案、账簿在战乱、动荡中消失殆尽），目前，这方面确实、详细的证据还比较少；但是，山陕商人活动区域与梆子腔流播地区的惊人吻合，各种声腔荟萃于各地盐商势力云集的扬州，以及著名的徽班进京等不争的事实，都在言说着商路就是戏路这一戏曲发展、传播的客观规律。而会馆剧场，就是这种戏曲发展、传播的重要载体。

附：全国现存会馆剧场名录

会馆名称	别名	创建时间	现地址
北京阳平会馆	平阳会馆	明末清初	北京市崇文区小江胡同 32—38 号
北京湖广会馆		道光十年 (1830)	北京市宣武区虎坊路 3 号
北京正乙祠	银号会馆	康熙四十九年 (1710)	北京市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前门西河沿街 220 号
北京安徽会馆		同治十年 (1871)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街道后孙公园胡同 25 号
北京平遥会馆	颜料会馆	乾隆六年 (1741)	北京市崇文区北芦草园胡同 85 号
北京临汾会馆	临汾东馆 临汾乡祠	明代，清乾隆三十一年 (1766) 重修	北京市崇文区西打磨厂街 105、109 号
北京山西会馆		民国初年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大街 128 号
上海钱业会馆		光绪十九年 (1893)	上海市区南部旧城东北部之豫园内
上海三山会馆		宣统元年 (1909)	上海市南市区中山南路 1551 号
上海南市商船会馆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上海市南市区南浦大桥中山南路引桥下会馆街 38 号
上海四明公所		嘉庆二年 (1797)	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景区青浦大观园
天津广东会馆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里大街 31 号
天津江西会馆	万寿宫	咸丰二年 (1852)	天津市红桥区估衣街
天津江苏会馆		光绪二十年 (1894)	天津市南开区仓敖街
天津安徽会馆		光绪年间	天津市河北区金钢桥西
天津怀庆会馆		光绪年间	天津市红桥区曲店街
天津闽粤会馆		清代	天津市红桥区北马路北门西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址
甘肃兰州陕西会馆		咸丰五年 (1855)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贡元巷

甘肃张掖山西会馆		雍正八年 (1730)	甘肃省张掖市南大街
陕西紫阳武昌会馆		宣统三年 (1911)	陕西省紫阳县瓦房店坡下河边沟口
陕西丹凤商帮会馆	丹凤花庙	嘉庆二十年 (1815)	陕西省丹凤县城龙驹寨
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		乾隆十年 (1745)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
河南开封山陕会馆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河南省开封市徐府街(原戏楼拆除,现存戏楼从东火神庙迁入)
河南洛阳山陕会馆	西会馆	康熙、雍正年间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南关马市街
河南洛阳潞泽会馆		乾隆九年 (1744)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东关新街南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	关帝庙	雍正十三年 (1735)	河南省周口市富强街111号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		嘉庆元年 (1796)创建、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建	河南省社旗县
河南伊川山陕会馆		清代	河南省伊川县
河南禹州山西会馆		嘉庆六年 (1801年)	河南省禹州市西北角市二中
河南禹州怀帮会馆		同治十一年 (1872)	河南省禹州市西北角
河南禹州覃怀会馆		清代	河南省禹州市博物馆
河南淅川荆紫关山陕会馆		道光年间	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
河南淅川川荆紫关湖广会馆	禹王宫	清代	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
河南洛宁山陕会馆		清代	河南省洛宁县老城街
河南辉县山西会馆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河南省辉县市
河南辉县平甸山西会馆		雍正四年 (1726)	河南省辉县市平甸乡



河南郑县山陕会馆		嘉庆二十四年（1819）	河南省郑县
河北保定三晋会馆	山西会馆	乾隆五十六年（1791）	河北省保定市东大街织绒厂
河北保定浙绍会馆	绍兴会馆	光绪二十六年（1900）	河北省保定市市府前街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		乾隆八年（1743）创建、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建	山东省聊城市东关古运河西岸
山东烟台福建会馆	天后行宫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山东省烟台市南大街
江苏苏州全晋会馆		光绪年间	江苏省苏州市城东中张家巷
江苏苏州潮州会馆		康熙四十七年（1708）	江苏省苏州市上塘街 279 号
江苏苏州嘉应会馆		嘉庆十八年（1813）	江苏省苏州市胥门外枣市街 22 号
江苏苏州安徽会馆		清代	江苏省苏州市西环路来凤东桥北堍
江苏徐州山西会馆		乾隆七年（1742 年）	江苏省徐州市南郊云龙山东麓
浙江宁波庆安会馆	甬东天后宫	咸丰三年（1853）创建、2001 年复建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 156 号
浙江宁波安澜会馆		道光六年（1826）创建、2001 年复建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庆安会馆南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	关帝庙	康熙十五年（1676）	安徽省亳州市城北
安徽六安涇川会馆		清代	安徽省六安市
安徽霍山新安会馆戏楼		清代	安徽省霍山县
江西景德镇饶州会馆	芝阳书院	乾隆年间	江西省景德镇市周口路 6 号
江西景德镇湖北会馆	湖北书院	道光年间	江西省景德镇市彭家下弄 7 号副 1 号
江西景德镇都昌会馆	古南书院	乾隆年间	江西省景德镇市风景路

湖北谷城盛 嶧江西会馆	万寿宫	清代	湖北省谷城县盛嶧镇前街 120 号
湖北樊城抚 州会馆		嘉庆七年 (1802) 前	湖北省襄樊市樊城沿江路 与陈家巷交汇处
湖北沙市川 主宫	蜀英会 馆	乾嘉时期	湖北省沙市沙市区碧波路 17 号
湖北宣恩晓 关禹王宫	湖广会 馆	同治三年 (1864)	湖北省宣恩县晓关镇
福建福州乌 塔会馆	石塔会 馆	清代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下殿 里乌塔旁
福建漳州江 西盱南会馆	万寿宫	咸丰四年 (1854)	福建商漳州市东门街达聪 巷
四川成都洛 带广东会馆	南华宫	乾隆十一年 (1746)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 带镇主街
四川成都洛 带江西会馆	万寿宫	乾隆十二年 (1747)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 带镇主街
四川成都洛 带湖广会馆	禹王宫	乾隆十一年 (1746)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 带镇主街
四川成都洛 带川北会馆		同治年间重 建、2000 年迁 建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 带镇
四川自贡西 秦会馆	武圣 宫、陕 西庙	乾隆十七年 (1752)	四川省自贡市中心解放路 东段
四川自贡南 华宫	广东盐 商会馆	清代	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贡井 街南华巷路 6 号
四川自贡贵 州庙		约乾隆五十年 (1785) 前	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贡井 街新华街 21 号
四川自贡仙 滩天上宫		道光三十年 (1850)	四川省自贡市仙市镇
四川自贡仙 滩南华宫		同治元年 (1862)	四川省自贡市仙市镇
重庆走马山 西会馆		清代	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
重庆湖广会 馆	禹王庙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长江 边

重庆广东公所	南华宫	康熙年间	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长江边
重庆安齐公所	帝王宫	嘉庆年间	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长江边
广西贺州黄田湖南会馆		咸丰十一年（1861）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黄田镇黄田村
广西恭城湖南会馆		同治十三年（1874）重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县
云南会泽江西会馆		康熙五十年（1711）	云南省会泽县二道巷北端
云南会泽云南会馆		乾隆六十年（1795）	云南省会泽县会泽一中内
云南会泽福建会馆	天后宫	清中期	云南省会泽县林壁路 63 号
云南会泽四川会馆	川主庙	乾隆十七年（1752）	云南省会泽县西直街 186 号
云南会泽贵州会馆		嘉庆十六年（1811）	云南省会泽县东外街中段

（车文明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山西临汾，041004）

《中华戏曲》第 37 辑

[1] 葛其龙清光绪九年（1883）上海《重修建汀会馆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78 页。

[2] 《上海县续志》卷二“建置”。

[3] 参见民国《芜湖县志》卷四十八“人物志·宦绩”之“俞谟”、乾隆《浮梁县志》卷七“建置志”、《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同治七年（1868）邓华熙《重修广东旧义园记》等。

[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畿辅·会馆”，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608 页。

[5] 明·刘侗、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卷四“嵇山会馆唐大力士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6]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首“陈宗蕃序”，民国三十二年（1943）铅印本。

[7] <,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首“程树德序”。

[8] 吕作燮《南京会馆小志》，《南京史志》1984年第5期。

[9] 清·顾禄《桐桥倚櫂录》卷六，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

[10] 清嘉庆十八年《姑苏鼎建嘉应会馆引》，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1页。

[11] 清·徐珂《清稗类钞·宫苑类》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第185页。

[12] 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3]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98—111页。

[14] 李金龙、孙兴亚主编，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宣武区档案管、图书馆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15] 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编》“附录”，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16] 民国《夏口县志》卷三“建置志”。

[17]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18]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9] 《修建临襄会馆碑记》，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20] 《新建豫章会馆始末碑》，《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336页。

[21] 《重修天后列圣碑》，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22] 清乾隆四十二年苏州《重修东齐会馆碑记》，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9页。

[23] 聊城山陕会馆清嘉庆十四年《山陕会馆众商重修关圣帝君大殿财神大王北殿文昌火神南殿暨戏台看楼并新建飧亭钟鼓楼序》，陈清义、刘宜萍《聊城山陕会馆》，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24] 何振岱民国五年上海《创建沪南果橘三山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359页。

[25] 同治《汀龙会馆志·序》，转引自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357页。

[26] 李家瑞《北京风俗类征·宴集》引《京尘杂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17页。

[27]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汉口山陕西会馆志》，据其中《汉口西会馆地理图》与两篇《总图记》，共有关圣殿、财神殿、天后宫、文昌殿、七圣殿前5坐戏楼。

[28] 周华斌《京都古戏楼》第五章“京都演剧场所旧迹一览表”，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251页。

[29] 作者统计为28处，其中“平遥会馆戏台”与“北京山西颜料会馆戏台”实为一处，两处“广东会馆”亦为一处，故实有26处。参见王强《会馆戏台与戏剧》之“会馆戏台调查统计表”，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85—197页。

[30] 李金龙、孙兴亚主编，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宣武区档案管、图书馆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之“北京会馆戏楼状况统计表”仅罗列20处，不少碑刻资料提及的戏楼被遗漏，但仍有新增者；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5页。

[31] 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清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书中有照片，《北京会馆资料集成》第1210页收录，并言“拆掉戏楼盖了财贸学校大楼”，但“北京会馆戏楼统计表”失载。

[32] 同治《汀龙会馆志》，转引自王日根《中国会馆史》第214页。

[33] 由会馆内乾隆四十七年《创建春秋楼碑记》可知，首创主体建筑春秋楼落成于是年。据传，建造该楼用了20余年。

[34] 以上参见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清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

[35] 庙内道光二十五年《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中国戏曲志·山东卷》，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4年版，第628页；陈清义、刘宜萍《聊城山陕会馆》，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36] 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清代部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37] 何振岱民国五年上海《创建沪南果橘三山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359页。

[38]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一“福建会馆”。

[39] 同治《汀龙会馆志》，转引自王日根《中国会馆史》第317—319页。

[40] 北京清嘉庆二十二年《重建药行公馆碑记》，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94页。

[41] 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859页。

[42] 《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下），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第34页。

厦门大学图书馆